

吊诡的新人 ——“十七年”小说中的小资知识分子形象^{**}

□张 莉 [浙江大学 杭州 310028]

[摘要] “十七年”小说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被主流意识形态严格规训的对象,其分类变化与被“规训”的演变轨迹折射出意识形态不同侧面的要求与压力。本文从小资的类型、“个体”与“大众”的摩擦、小资自我的斗争三方面展开,在多重话语的碰撞与对话中分析并论述了“十七年”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艺术形象逐步退居边缘直至瓦解的复杂过程。

[关键词] 小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 规训; 对话

[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105(2008)01-0084-04

1949年8月,关于“可不可以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作品主角”的讨论在上海《文汇报》上成为一个热点,虽然有“应当少写、批判地写”和“绝对不可以写”等意见,但最后却都落脚在“怎么写”的统一认识上来。但“怎么写”才更符合“工农兵文艺”方向并不像“写什么”那么容易明确,因为后者属于“题材”问题,而前者需要作家“世界观”的根本转变。所以,这场争论其实是一个信号,它表明叙述和如何叙述小资人物已不是一个审美话题,而成为一个意识形态问题。

在强大的意识形态话语氛围中,“十七年”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小资知识分子形象发生了剧烈分化:一部分为灰色小资知识分子,处于被高大光亮的工农兵“新人物”映衬下的落后、偏狭、反动的地位,承担起被批判、被谴责的叙事角色;另一部分走向革命,追慕英雄成长,成为红色小资革命者。可是,他们再也不是作为革命的知识分子精英阶层登场,而是作为革命的追随者、“落后者”被塑造。根据不同需要,红色小资又被分为两种主要类型:第一类,小资革命者已是成熟了的或者说基本工农化了的革命英雄而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小资分子,《红旗谱》中的贾湘农,《红岩》

中的刘思扬、成岗,《小城春秋》中的四敏、剑平,《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东等无不如此。另一类以林道静为代表的红色小资则踏上了历经重重磨炼、接受重重考验、最终脱胎换骨,被纳入“新人”行列的“成长”历程。

对灰色小资知识分子的描写,“十七年”文学多采用“反差式”:浪漫美丽的外表与丑陋自私的内心形成强烈对比。如果说《红豆》中男女主人公的“小资爱情”因温情和感伤而不失真诚的话;《在悬崖上》小资人物的私人情感具有了政治寓意:凡是道德上不坚定的小资知识分子在被不良情感诱惑时将直接危害革命;《来访者》则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恋爱失败带来的沮丧情绪与“反右”斗争挂上了钩,爱情失意者被叙述为对抗新社会意识形态的“不纯”分子。此种类型化的描写同样出现在该时期的其他文艺作品中,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话剧《千万不要忘记》中,小资知识分子自私散漫的特点直接被叙述为对革命事业的潜在威胁……曾经作为“普罗文学”和“红色30年代”中革命倡导者、行动者甚至阐释者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退居舞台边缘,其冒险冲动、勇于牺牲的革命激情与偶尔消极的情感波动统统被归入到“失范”的情感表达方式之中。1951年由冯雪峰、丁玲、康濯等人在《文艺报》上发起对小说、电影《关连长》、《我们夫妇之间》等的评判,把对小资趣味和情调的批判掀

• [收稿日期] 2007-04-01

• [作者简介] 张莉(1978—)女,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研究生。

到了高潮。评论指出,《关连长》在对革命先烈的塑造上夹杂着小资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和小市民对军人“大老粗”的嘲弄,更有甚者,作者居然让关连长为了保护孩子和学校而作出“无谓牺牲”。将“神圣的纪律”、“战斗的安排”这些代表高效组织计划的现代性观念牺牲于次要的问题和矛盾——孩子的生命。^[1]因为不容许有任何程度的暧昧缝隙和丝毫难以被革命意识形态纳入话语体系和叙事模式的“小资”伤感存在,《洼地上的战役》尽管对爱情的描写“发乎情,止乎礼仪”,依然难逃被指责的命运。

《讲话》发表之前,从上海来到革命根据地的小资产阶级进步青年陆萍最得五四时期小资莎菲的精髓。她以知识女性和革命女战士的使命感与批判意识试图改变革命环境与政权状况的“病态”,而且以一种拒绝改造的强硬态度将支部对她的有关“小资产阶级意识、知识分子的英雄主义、自由主义等等”的批评统统定义为是给她戴“帽子”。然而,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和意识及其蕴涵的现代性设想迅速被制止和清除,在“百花年代”的“干预现实文学”中终归昙花一现。“十七年”中,《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林震对官僚机构表现出难得的批判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小资革命者精神特质的局部回归,然而,这一切都无力挽回小资知识分子革命者作为革命精英精神优势逐步丧失的大势。

二

“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从亭子间来到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新的革命政权以其特有的话语修辞在现代意义的时间叙事结构中给小资产阶级设定了“迟到的感”和“落后感”。为了拯救自己,小资产阶级必须来一番改造,必须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但是,正如李陀论述中国红色知识分子时所说过的:“就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而言,在整个民主革命和新中国时期,他们并不是一生受难的可怜虫,也不只是一些被动、机械的齿轮和螺丝钉”,“被种种‘受难史’掩盖起来的事实是:知识分子都有过浪漫的、充满理想的‘参加革命’的经历,有过‘建设共产主义’的激情,也有过高呼‘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豪迈和气概。这些记忆是不应被抹煞的”^[2]。所以,当小资产阶级参与革命先锋队释放着“追赶”现代性的焦虑、满足着自身的使命感与历史参与感的同时,其五四精神资源、新式教育背景与都市生活经历形成的

意识与被称为“情调”的现代性气质都无法与高度集权的意识形态完全合拍,小资产阶级思想“顽固”地蛰伏在各个角落,时时与“十七年”主导意识形态形成对峙与对话。

《红岩》中的江姐,虽然被突出的是布尔什维克的崇高品质,但最光彩夺目的却是其知识女性气质;小资产阶级情调在《刑场上的婚礼》中成了审美的对象:全剧高潮处恰恰是革命先烈牺牲前革命浪漫情怀张扬之时;《百合花》因不合当时的文学模式而屡遭退稿,刊发后又因风韵独特而不为人解,作品对细节的成功描写与渲染自茅盾始就为评论者津津乐道,但是,所谓表现了“军民鱼水关系”不过是滥用当时流行的政治概念分析作品的结果。如果从个体生命的立场出发就会发现,作者并没有按照理性的规范去渲染小通讯员勇救民工的壮举,而是直接从自己真切的生命感受出发,念念不忘百合花的被子、衣服上的破洞、枪筒上的小花和两个干馒头……在象征着死亡的枪口上插朵小花,体现了作者任何环境下都不能丧失对细微处的珍惜的理念,因为,越是细微处才越能衡量出人与人之间情意的深浅。这种价值取向无疑是“五四”以“人”为大旗的脉络在50年代文学中的潜隐与延伸。如果说《百合花》透过时代社会题材描写了个体生命的血肉之躯,那么,《红豆》则是通过对婚姻爱情的叙述展现了个体生命的另一种不可消失性。在情节构架上,作者对齐虹是批判的,但是每当触及对齐、江的爱情描写时,笔调总是脱离批判的立场而变得温情无比:“他们散步,散步,看到迎春花染黄了柔软的嫩枝,看到亭亭的荷叶铺满了池塘。他们曾迷失在荷花清远的微香里,也曾迷失在桂花浓酽的香甜里,然后又是雪花飞舞的冬天。”但是,情感必须让位于厚重的社会时代内涵,爱情不得不凋谢在政治革命的风暴之中。作者站在历史进步的立场上让有情人天各一方,但对生命为此做出牺牲的遗憾充满了字里行间。对此,有批评者指出,“投身革命与个人感情生活,在小说中并没有被处理成完全一致”^[3]。但恰恰是作者对“小资情感”的细腻描写和惋惜之情深深打动了读者……。

然而,在高度净化的主流意识形态掌控下,纵然有闪烁着启蒙光亮的声音;纵然有高长虹的愤然出走表现知识分子在文化信仰上的坚守与执着;有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中批评解放区女性歧视为妇女同志鸣不平;有王实味在《野百合花》中将革命圣地存在等级差别斥责为“衣分三色,食分九等”,经过不断地选择与调节,周立波、艾青、何其芳、丁玲、萧军等人最终还

是接受了文艺秩序的安排,归顺到了“工农兵文艺”的阵营之中。丁玲将之解释为“从一个阶级投入到这一个阶级来”,“把一种人格改造成那一种人格”^[4]。周立波则是用忏悔的心情说,我们都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身子参加了革命,心还留在自己阶级的趣味里,我们上了资产阶级的当。没落阶级有时提倡自由文化,标榜为艺术而艺术,来欺骗民众,我们跟着也糊里糊涂的,不和斗争着的工农协同一致,努力去争取民族的、阶级的自由,却向着自己的人来胡闹了^[6]。

三

如果说知识分子“个体”意识与“大众”的摩擦来自两个不同阵营的必然对峙,两者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那么,在向大众仰视的过程中,小资知识分子在自我内心战场上经历了怎样的挣扎与斗争?《青春之歌》,这部唯一风行于“十七年”间描写知识分子“成长”的作品,在叙述时代主流意识的同时,展现了“小资”复杂的心灵历程。

就显层的、主导的故事结构而言,林道静和余永泽、卢嘉川、江华之间的爱情与共产党/知识分子这一意识形态符号互相支持,但作为深受五四个性主义精神濡染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根植于内心深处对爱情的浪漫幻想及选择上体现出的个人意志与集体意志并不完全吻合。如果说道静在男/女关系上由余永泽而卢嘉川再到江华的转移,在逻辑层面上是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抛弃个人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而成为共产主义战士这一过程互相支持的话,那么,在非逻辑层面上,道静的情绪、潜意识和叙事话语却闪烁其辞。所以,刚一面世,针对它的批评和争议就迅速出现了。郭开认为林道静的塑造存在“较为严重的缺点”,“作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进行创作的”,林道静从未进行深刻的思想斗争,她的思想情感没有经历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转变,“可是作者给她冠以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结果严重地歪曲了共产党员的形象”^[7]。还有批评者指出,道静与多个男子的恋爱关系“不健康”,是小资产阶级情感泛滥所致。然而,恰恰是在“感情问题”上,叙述者对林道静这个形象的处理特别谨慎。如果说林道静和余永泽分道扬镳,与卢嘉川欲爱不能,最后与江华结合表达的是“在一次精神的再生与洗礼中,以重获纯白的女儿身份,再度从父”这一主流意识形态主题的话,那么在叙事过程中,林道静通过对三个男性的“凝视”所流露出的

个性意识和个人自由意志却对“从父”主题表达了适度的“反抗”。

尽管余永泽与林道静的结合是自由的,本身具有反封建礼教性,但他深层的婚姻爱情观还是传统的“郎才女貌”。于是慢慢的,在道静眼里“余永泽并不像她原来所想像的那么美好,他那骑士兼诗人的超人的风度在时间面前已渐渐全部消失。”可见,对骑士风度的倾慕是她的一个心理情结——非常五四化(小资产阶级化)的审美标准,这种标准如此坚定巩固,甚至没有随着她政治上的“成长”而改变。当初,余永泽吸引她的是在大海边低吟诗歌的浪漫和勇救落水少女的骑士风度,他们今天的分道扬镳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他骑士风度的被揭穿:他把道静的美丽和对她的爱作为自己发奋的内驱力,却漠不关心她的精神追求。同为拯救者,余永泽拯救的是肉体,是传统的“英雄救美”模式的再现;卢嘉川拯救的是灵魂,是一个伴随革命者勇敢前行的战斗单位。因此,当现代革命超越五四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后,前者的失败与后者的成功自然无需证明。可是,让道静抛弃对她有过救命之恩的余永泽而选择卢嘉川,无法回避的,是良心的自我谴责。她要做的,是突破自己的心理防线。文本设计了种种摩擦,包括通过对待讨饭魏三大伯态度上的不同“阶级立场”的根本分歧来夸张他们之间的裂缝和对立,但这也不足以构成她离开的理由。于是,小说在情节设置上对“小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了一次不失时机的利用,让最富有小资情调的知识分子余永泽承担了导致卢嘉川落入敌手的间接罪责。据此,道静以革命的名义抛弃小资爱人被叙述得名正言顺。在时代变革的大形势中,作为和整体相疏离的另一种个体生命形态,余永泽是应该被批判的,但从客观角度来看,他固然没有参加革命,但也没有反对革命;他虽然没有关注时代风云,但安心书斋传承文化,又何罪之有呢?作为一个个体的知识分子,在时代风云变幻、社会变革迫在眉睫之时,该何去何从?虽然我们不能用非历史的眼光打量余永泽当时的所作所为,但他出于个体安危对社会暴力行动抱有恐惧,出于个体情感看重家庭的选择,恐怕也不该如作品那样给以简单否定就能了事。

江华是不是一个骑士呢?不是。小说中,不仅余永泽被用来和卢嘉川作对比,江华同样也处于和卢嘉川的比照当中。当江华自责自己对道静帮助太少时,道静立刻想到了卢嘉川:“我把你看成我的恩师……我一直非常感谢你对我的培养……你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人,这一点卢嘉川都不如你。”接着说:“你也像父

亲一样替我另起一个名字吧。”这些话包含了丰富的潜台词:在道静真实的想像中,江华是一位父亲而非爱人。所以,当江华向她求爱时,她感到的是“惶乱、不安、甚至是痛苦。”她说服自己接受的理由是“真的,像江华这样的布尔什维克同志是值得她深爱的,她有什么理由拒绝这个早已深爱自己的人呢?”显然,这是思想理智和政治上的接纳而不是感情上的接受,她的感情只属于那个英俊的骑士卢嘉川。和卢恋爱时,林的“改造”还处于“自愿”阶段,到了与江华结合时,已是“别无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这两段爱情可以隐喻和解释现代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及革命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以及现代知识分子话语“逐渐沦落”的微妙过程。

卢嘉川作为“党”的人格化身出现在道静面前,而道静最终与之结合的江华则是她的入党介绍人,这是一个完整的政治寓言,忠实地实践着对主流意识形态神话的建构,卢的“及时”牺牲使林卢之恋因避免肉体上的直接接触而表现得更为崇高。然而,在这个神话建构的过程中依然包含着一个爱情故事。小说这样描写卢嘉川被捕后道静对他的思念:“失掉了卢嘉川的领导,失掉了党的爱抚,她觉得自己重又变成了死水里的蝌蚪。”这是一段含义复杂的话语,男人以党的形象出现,可女人体味到的却是“爱抚”。这里,性话语“爱抚”对政治话语“领导”的置换以一股切肤可感的情感冲击力量实现了对主流的颠覆。社会规则固然如父亲般让人臣服,但生命的激情却让人刻骨铭心……经过一系列的挫折和受难,克服了重重内在缺陷,“成长”后的道静无论肉体还是灵魂都得到了拯救与升华,融合在革命群众的队伍里,行进在“一二·九”运动的游行人群中,“无穷尽的人流,鲜明夺目的旗帜,嘶哑而又悲壮的口号,继续沸腾在古老的古都

街头和上空,雄健的步伐继续在不停地前进——不停地前进……”^[7]

作为“十七年”文学中的弱势群体,小资知识分子形象是“十七年”权威意识形态的重点规训对象。从建国到“文革”,小资形象分类变化和被“规训”的演变轨迹折射出意识形态不同侧面的要求和压力。当舞台被极端模式化的英雄形象全面占领之际,小资知识分子形象全面崩溃。直到“新时期文学”拉开序幕,小资知识分子的形象才得以复活。然而,出乎当时所有人意料的是,“小资”这个概念数十年后竟然摇身一变、脱胎换骨——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被用于形容一个由优雅、品位、精致集合而成的浪漫空间。半个世纪前的《讲话》中,毛泽东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批评小资意识和情调,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相对于用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权,在文化领域肃清小资分子的路途还远为漫长。

参考文献

- [1] 梁南. 谈《关连长》中错误的军事思想[N]. 文艺报, 1951-6-25(4).
- [2] 李陀. 丁玲不简单[J]. 北京文学, 1998, (7): 134-135.
- [3] 洪子诚. 中国当代文学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143.
- [4] 丁玲. 关于立场问题我见[J]. 谷雨, 1942, (5): 34-35.
- [5] 周立波. 后悔与前瞻[N]. 解放日报, 1943-4-3(4).
- [6] 郭开. 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评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J]. 中国青年, 1959(2): 53-54.
- [7] 杨沫. 青春之歌[M].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2: 612.

On the Petty Bourgeoisie Intellectuals in the Novels of “17Years”

ZHANG Li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Petty bourgeoisie intellectuals in the novel of “17Years” either follow the image character of the heroes of workers, peasants and soldiers or are portrayed as “evils”. The aesthetics character of petty bourgeoisie intellectuals at that time reveals that the major ideology is not only anxious about petty bourgeoisie intellectuals but at odds with them.

Key Words ideology; intellectual; morbid state; the rule training

(编辑 范华丽)

吊诡的新人——“十七年”小说中的小资知识分子形象

作者: [张莉](#), [ZHANG Li](#)
作者单位: [浙江大学, 杭州, 310028](#)
刊名: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 卷(期): 2008, 10 (1)

参考文献(7条)

1. [梁南](#) [谈<关连长>中错误的军事思想](#) 1951
2. [李陀](#) [丁玲不简单](#) 1998 (07)
3. [洪子诚](#) [中国当代文学史](#) 1999
4. [丁玲](#) [关于立场问题我见](#) 1942 (05)
5. [周立波](#) [后悔与前瞻](#) 1943
6. [郭开](#) [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评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 1959 (02)
7. [杨沫](#) [青春之歌](#) 1992

本文链接: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zkjdxsb-shkx200801021.aspx